



抗联名将冯治纲：保家乡美名扬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抗联英雄园松林苍翠，一尊勒马扬蹄、奋勇呼喊的铜像气势如虹。这尊铜像描绘的是东北抗联名将冯治纲率军冲杀的场景。1940年，阿荣旗这片土地上，冯治纲在与日军激战中牺牲，年仅32岁。

“有一位抗联将军冯治纲，带领骑兵跋涉在西征路上。他驱逐日寇保卫家乡，他英勇善战美名扬。”呼伦贝尔东北抗联纪念馆讲解员冯丽霞根据英烈事迹创作了歌曲，用歌声缅怀这位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指挥员。

冯治纲1908年出生于吉林省，成长于黑龙江省汤原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治纲回乡务农，后进入当地一家金矿工作。次年，冯治纲与兄长冯治国一起加入护矿队，利用金矿枪械进行对敌斗争。此时护矿队与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汤原游击队已有联络。

1934年，一次惨烈战斗后，护矿队成员所剩无几，冯治国牺牲，冯治纲组织仅存的一点力量成立文武队，与日伪军周旋斗争。这支队伍以红军纪律为规章制度，一年时间发展成为60余人的战斗力量。

1935年秋，文武队加入汤原游击总队，冯治纲任中队长。在小兴安岭地区，冯治纲等人拔伪军据点、缴敌军枪械，不断壮大敌后武装力量。次年1月，汤原游击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冯治纲任第三团团副。在军长夏云杰带领下，这支部队先后取得“智取老钱柜”“奇袭鹤岗煤矿”“拦截日军火车”“伏击尹家大院”多次战斗胜利，智勇双全的冯治纲屡立奇功。

1936年6月，冯治纲正式加入中

国共产党，以战火淬炼信仰，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在敌军“篦梳式”多兵种密集围堵下，冯治纲率队顶朔风、忍饥寒、破重围，如一把尖刀刺向数倍于我之敌。1937年，冯治纲指挥部队夜袭汤原县城，营救出数十名各方人士，重创敌军。日军战报中这样描述这场战斗：“此战我方损失是很大的……掠走迫击炮三、轻机三、步枪三十、炮弹九十六、枪弹三万五千粒。”

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年之际，冯治纲率部力克讷河县城，俘虏伪军团长、解救被捕战士、缴获大量物资，极大振奋军民斗志。冯治纲部半年时间与敌作战70余次，成为敌军“眼中钉、肉中刺”。

1940年1月14日，冯治纲在就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龙江北部指挥部指

挥时说：“旋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不能不以高度之革命热诚效忠祖国，矢竭愚忱，誓必与日寇周旋于龙江旷野。”半个多月后，冯治纲率军至阿荣旗三岔河一带，登山观察敌情时与日军遭遇，不幸牺牲。3天后的农历除夕夜，阿荣旗一片寂寥，密林之中满是悲愤热泪。

“血染征衣，壮志未酬恨无极。慷慨捐躯痛别离。庭间铭题，雪前仇，永弗替，追悼烈士，腊月二十七。”时有挽词，不胜悲恸。

每逢腊月二十七，冯治纲殉难处碑石旁，抗联英雄园奋勇策马的铜雕前，总是布满鲜花。“救亡壮志永矢兮弗援。”冯治纲生前就职的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歌声，在兴安岭苍翠松林中永远回荡。

(据新华社)

林汉达编写《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54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他注意到，白话文普及后，文言写成的“二十四史”距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市面的历史演义又多有虚构，不适合大众尤其是青少年阅读。本身深耕语言学、热爱中国历史的他决定为大众编写一套通俗严谨的历史读物，初衷是给当时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众普及历史，打破文言文对历史传播的壁垒，让更多人了解民族历史、增强文化认同。

林汉达为这套定名为《上下五千年》的读物搭建了框架，拟定了120则故事的大纲，计划从上古写到鸦片战争。他在选材上坚持“史实可靠、通俗易懂、故事生动”的原则。

为了让作品真正做到普通人能看懂，来自浙江宁波的林汉达特意深入北京居民中学习地道口语，写好的文稿反复请本地知识分子修改，全程坚持用“京白口语”转述历史，采用“素译”的方法，把正史内容打散重编成独立故事，既保留史料真实性，又兼顾可读性，避免学术作品的晦涩感。

遗憾的是，1972年7月26日，林汉达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逝世，此时《上下五千年》仅完成了从上古到东汉的部分内容。

“文革”结束后，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发现了这份遗稿的价值，组织人员按照林汉达的编写理念完成了续写，最终这部凝聚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心血的历史通俗读物正式出版，成为影响了几代人的历史启蒙作品。

(据《人民政协报》)

古代“青年”非青年

在一些报纸副刊上，总少不了“古代也有青年节”“古诗词里的青年”之类的文章。然而，古代真有“青年”这个概念吗？

《现代汉语词典》对“青年”的定义是指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16至45周岁，国家统计局认为是15至34周岁，全国青联则把18至40周岁的人视为青年，没有统一标准，各执一词。

古人倒没这个烦恼，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青年”这个概念。我国古代，根据男子成长过程的特点，以十年为单元，将人生大致分为九个阶段。《礼记·曲礼》记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这套划分里，没有“青年”。

古人表达“年轻”的意思，常用“后生”或“少年”。东晋葛洪在《抱朴子》里提出了“青人”，有学者认为其意思接近于今天的“青年”，但这个词并没有流传开来。

“青年”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唐代。唐代诗人牟融的《寄张源》里有这么一句：“青年俱未达，白社独离群。”这里的“青年”，意思是“年轻”，是一个形容词，而非名词。

宋代以后，“青年”一词逐渐出现在各类文献中。宋末，文天祥写下“相思处，青年如梦”的诗句，这时的“青年”已接近现代的青年概念。从元代开始，文献中关于青年的描述多了起来，剧作家关汉卿有“青年敏学，有治才”等词句，元代谢应芳词中有“爱尔青年二十余，无心富贵独耽书”“青年去了，青衫破了”之语。清代的郑板桥也写过“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怀豪宕倍从前”。

由此可见，古代汉语里确实有“青年”一词，尤其越到后期，它的用法越接近今天。即使如此，古代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仍有本质区别。古代没有形成一个被制度化的“青年期”，二十岁行了冠礼，你就是“成人”了，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来“探索自我”。古代社会结构简单，身份转换是瞬间完成的，所以古人也就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词来指代那个“既不是孩子也不是大人”的群体。

今天的“青年”概念，是工业革命、青春理论、义务教育普及和五四运动之后的产物。它是一个社会学的分类，指向一个独特的年龄群体和文化认同。

古代没有“青年节”，但古人会有自己的方式纪念“成长”，比如二十岁行冠礼，宣告“你成年了”；女孩子十五岁行笄礼，盘起头发，表示可以嫁人了。只不过，他们都不叫“青年”这个名字罢了。

所以说，古代的“青年”非当代的青年。词同义异，差的竟是一千年的社会变迁。所以，当你再看到“古代青年”之类的说法时，不妨一笑置之。

(据《海南日报》)

王崇实：少年怀国志 热血铸英魂



王崇实像。

新华社发

“我有牺牲的精神不可捐。”这闪烁着青春蓬勃朝气的诗句，是时年21岁的共产党员王崇实在1936年写的，这正是王崇实短暂人生的光辉写照。王崇实，1915年出生于蓟县门庄

子(今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门庄子村)一个书香家庭。他的父亲王秀冬在村里义务教书，是一位深受五四运动新思想影响、主张教育救国的爱国人士。耳濡目染下，少年王崇实逐渐成长为一位忧国忧民、思想进步的革命青年。

王崇实的侄子王新增介绍，王崇实尤其喜欢文学，爱看革命书刊，从十多岁就开始写童话，后来又尝试写小说和诗歌。他写的《麦田里的风波》用散文形式描写拾麦穗的穷孩子和地主儿子斗争的故事，正是他组织穷孩子拾麦子的经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王崇实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他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抗日活动，因此被学校开除学籍。回到老家的王崇实没有停下参加革命活动的脚步，为躲避地方反动政权的抓捕，他辗转来到唐山赵各庄煤矿的中学求学，边上学边开展革命工作，在18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之后，王崇实再次被学校开除，党组织指派他到林西、古冶一带从事工运工作。没有收入来源，他就以

拾煤核、做小工为生，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工人举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罢工活动，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1936年，王崇实回到蓟县家乡，先后在别山镇和朱华山村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并经常自编教材对少年儿童进行启蒙教育。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蓟县县委组织掀起大规模群众抗日救国运动，王崇实在蓟县从东向西再向南开展工作，足迹几乎遍及蓟县城乡，在多地建立起党的组织。因为他活动能力强、工作积极主动，逐渐成长为当时冀东西部的党员骨干。

1938年4月，王崇实参加了蓟县县委在盘山千佛寺召开的武装暴动筹备会议，时年23岁的王崇实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蓟县县委书记。

冀东抗日武装暴动开始后，王崇实和多位骨干一起组建了抗日联军第五总队并担任政治主任。7月底，王崇实带领暴动队伍配合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其他抗联队伍攻克蓟县县城。战斗中，他总冲锋在前。王崇实常对老党员说：“共产党员为革命，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要抗日就不要怕牺牲。”

(据新华社)

巨炮神威撼八方

——中国古代改进型火炮

明中期以后，大航海时代浪潮推动中西方交流日益密切，西方新式枪炮技术通过战争缴获、传教士传播、贸易中转等途径传入中国，直接推动明朝火器技术革新。以佛郎机炮、红夷炮为代表的西洋火炮凭借远射程、高射速、强威力等优势，逐渐取代传统的銃炮，开启了中国火器近代化转型的序幕。

佛郎机炮作为15世纪后期流行于欧洲的改装火炮，其技术雏形可追溯至14世纪末的西班牙，1410年左右由葡萄牙人改进成现在我们所常见的佛郎机炮形态。新航路开辟后，佛郎机炮成为西方殖民者重要的舰载火器，他们借此大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

一般认为，佛郎机炮传入中国是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正德十二年，刑部尚书顾应祥在广州城外锚泊的葡萄牙舰船上见到了这种舰炮。嘉靖元年，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击败葡萄牙军，缴获20余门佛郎机炮。

相较于明朝传统銃炮，佛郎机炮在结构上发生较大变化。其一，采用“母銃衔子銃”的后装结构，母銃为炮筒，子銃为预填弹药的小型火銃，每门母銃可配4至9个子銃，能快速更换实现连续射击，射速远超前装式传统銃炮；其二，炮管壁厚均匀，可承受更高膛压，大幅降低炸膛风险，战场安全性显著提升；其三，炮身配备准星、照门等瞄准装置，有效增大射程并提高命中精度；其四，子銃与母銃嵌合紧密，较好解决了火药燃气泄漏问题，确保发射威力。鉴于佛郎机炮的突出优势，明朝军器局、兵仗局于嘉靖二年组织工匠仿制30余门，随后配发至北部边防与沿海驻军。



明朝时期的红夷炮。(资料照片)

大明工匠在仿制佛郎机炮的过程中，逐步掌握核心技术并发挥聪明才智，研发出多型更适配本土作战需求的佛郎机系列火器，包括“舰载佛郎机”“马上佛郎机”“万胜佛郎机”“佛郎机流星炮”等。这些火器各有侧重，适用于各种战场，成为明军破敌利器。

工匠还参照佛郎机炮原理改制传统銃炮，无敌大将军炮便是典型代表。它以旧式重型将军炮为基础改制而成，是一款车载重型火炮，重1050斤，行军时需依托拖车运载，每炮配备3个子炮。使用时，先在炮身下方垫放木块调整俯仰角度，再将子炮嵌入炮身的装弹室，对准目标即可发射。每发子炮内装有500余枚小铅丸，射出后弹着面积大，杀伤威力强。清朝前期的奇炮、子母炮，均属

于这类佛郎机式火炮的衍生型号。

佛郎机炮虽具备装填速度快的优势，但因子銃装药量小、母銃口径不大，导致其威力有限。当威力更为强劲的红夷炮传入我国后，佛郎机炮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红夷炮是明末对欧洲长管加农炮的称呼，于明万历后期传入中国。该炮以钢铁铸造炮身，膛壁后厚前薄，尾部设有尾珠；炮身中部装有炮耳，便于架设于炮车、炮架或炮台之上时调整仰角；炮身尾部还开有小孔，作为点火用的火门。

与包括佛郎机炮在内的各类古代火炮相比，红夷炮设计更为先进：它以口径尺寸为基数，按特定比例精准规划炮管长度、膛壁厚度、炮耳长度与直径等部件，整体结构科学合理，因此兼具身管长、弹道低伸、管壁

厚、安全可靠、射程远、命中精度高等优势。

明朝把进口和仿制的红夷炮用于抵抗后金的战争中，取得较大战果。天启六年，后金努尔哈赤率大军进攻宁远城，明军守将袁崇焕凭借12门红夷炮连续数次击退后金兵的进攻，并使努尔哈赤身负重伤。后金军在宁远战役中遭到重创后，领教了红夷炮的威力，也开始仿制红夷炮。

清军入关后，所制的红夷炮数量增多，比较著名的有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威远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及得胜将军炮等。它们大多沿袭明末红夷炮的样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它是一种大型前置火炮，制于清康熙十五年。该炮为铜质，炮身长2.48米，重2000余斤，口径110毫米，配备木制炮车。炮管前细后粗，底如覆笠，有五道加强箍，两侧有耳，尾部有球冠。炮口与底部正上方有“星”“斗”供瞄准用。每次发射装填3至4斤火药，炮弹重6至8斤。此炮多用于攻城守寨和野战，在与沙俄的雅克萨之战中曾发挥巨大作用。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在1674年至1721年间造各种火炮900余门。随着火炮的大量制造，康熙三十年成立火器营，专门练习枪炮的使用技术。雍正五年，清政府规定各省绿营兵每千人置炮10门，火炮成为清军的主要装备之一。清朝中期以后，火炮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为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各地军民又造了一些重型火炮。洋务运动开展后，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中国古代火炮逐渐被近代火炮所取代。

(据《中国国防报》)

古人入夏的健康体检

“立夏称人轻重数，秤悬梁上笑喧闻。”清代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中记述的“立夏称人”，是立夏经典民俗之一。古人认为，立夏称量体重可记录健康状况、调养身形，平安度过夏季，堪称古人的“入夏健康监测”。

据《中国民俗志·节日志》记载，立夏称人习俗，与民间传说“孙夫人称阿斗”相关。相传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将刘禅(阿斗)托付给孙尚香照料。孙尚香为尽心抚育刘禅，便在立夏当日当面称量其体重，此后每年立夏都会复测，记录刘禅的生长发育情况。这一做法流传至民间后逐渐成俗，后来还衍生出专门行当，有人会在立夏当日扛着大秤走村串户为民众称量，收取少量费用。

立夏称人，核心是古人顺应时节的健康管理智慧。立夏过后气温攀升，人易出现食欲不振、精神倦怠、身形消瘦等情况，因此古人会在立夏称量体重，立秋时再次复测，通过体重变化观察身体状况，及时调整养护方式。清代顾禄《清嘉录》载：“家户以大秤称人轻重，至立秋日又称之，以验夏中之肥瘠。”蔡云《吴歎》亦云：“风开绣阁扬罗衣，认是秋千戏却非。为挂量才上官秤，评量燕瘦与环肥。”清代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也记述：“杭俗，立夏日悬大秤，男妇皆称之，以试一年肥瘠。”诗人丁宜福则在诗中写道：“节交立夏记分明，吃罢馄饨试宝称。惭愧阿依消瘦甚，今年身比往年轻。”生动还原了立夏称人的民间场景。

古人称量的方式，颇具讲究。将大木秤悬挂于房梁或树干，秤钩悬挂竹筐或木椅，儿童坐于其中，青壮年可直接抓握秤钩称量。《海虞风俗竹枝词》中“时逢立夏出奇谈，巨秤高悬坐竹筐。老少不分开秤上，细绳一断最难堪”，正是对此场景的描写。

称量时，司秤者会将秤砣向外移动，寓意体重稳步增长；体重增加称“添福增健”，体重减轻则提醒注重调养。称量孩童时，会在其衣袋中放置石块，寄寓茁壮成长、体魄强健的美好祝愿。司秤者还会为不同人群送上吉祥祝福语：为老人祝“身体健康，福寿绵长”，为姑娘祝“身姿康康，喜笑颜开”，为孩童祝“茁壮成长，前程似锦”，以美好寄语传递对健康生活的期盼。

现代作家周作人也曾作诗记录这一习俗：“新装扛秤好称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斤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立夏称人之俗，是古人顺应自然、守护身心健康的生活智慧，彰显了应时而动、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从现代视角来看，立夏后日照延长、降水增多，气候湿热，人体代谢加快、消耗增大，易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心情不宁等情况。此时记录体重，能帮助人们感知身体变化，及时调整作息与饮食，侧重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更好地适应季节更迭。

如今，立夏称人虽不再是全民通行的习俗，但这份顺应时节、关注健康的生活态度依旧值得传承。它不仅是珍贵的民俗文化记忆，更提醒着我们顺应自然节律，以科学方式呵护身心，让传统习俗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

(据《西安晚报》)